



生活满意度 视角下的环境与 经济协调发展

曹大宇 常瑞甫 著



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

生活满意度 视角下的环境与 经济协调发展

常州大学图书馆
藏书章

曹大宇 常瑞甫 著



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生活满意度视角下的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 / 曹大字, 常瑞甫著. —北京:
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2.2

ISBN 978-7-5116-0748-5

I. ①生… II. ①曹…②常… III. ①环境—关系—经济发展—研究—
中国 IV. ①X22②F12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250901号

责任编辑 张孝安

责任校对 贾晓红

出 版 者 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

北京市中关村南大街12号 邮编: 100081

电 话 (010) 82109708 (编辑室) (010) 82109704 (发行部)
(010) 82109709 (读者服务部)

传 真 (010) 82109708

网 址 <http://www.castp.cn>

经 销 者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北京富泰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80mm × 1 230mm 1/32

印 张 5.125

字 数 128千字

版 次 2012年2月第1版 2013年1月第2次印刷

定 价 30.00元

目 录

第一章 引言	(1)
第一节 研究问题的由来	(1)
一、为什么要研究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的问题	(1)
二、为什么要从生活满意度的角度来进行研究	(3)
第二节 文献综述	(6)
一、关于可持续发展的思想	(6)
二、关于环境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研究	(8)
三、关于经济状况与主观幸福感关系的研究	(9)
四、关于环境因素与生活满意度关系的研究	(13)
第三节 研究目的、研究内容和技术路线	(15)
一、研究目的	(15)
二、研究内容	(16)
三、研究方法	(17)
四、创新与不足	(17)
第二章 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理论探讨	(19)
第一节 现代环境问题产生的原因分析	(19)
一、经济学对环境问题的一般解释	(19)
二、现代社会与环境问题	(21)
第二节 物质财富与人类社会的发展	(26)
一、适当的物质财富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	(26)
二、物质财富对人类发展的好处是有限度的	(26)

三、人类过度追求物质财富的原因·····	(27)
四、过度追求物质财富对人类发展的损害·····	(31)
第三节 生活满意度作为人类发展目标的理论说明·····	(33)
一、物质财富不是衡量社会进步的唯一标准·····	(33)
二、生活幸福是人们追求的终极目标·····	(34)
三、本章小结·····	(36)
第三章 我国环境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38)
第一节 我国环境问题概述·····	(38)
一、环境污染状况·····	(38)
二、资源使用状况·····	(41)
三、环境治理费用状况·····	(43)
第二节 我国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关系的EKC曲线分析·····	(44)
一、环境EKC曲线的概述·····	(44)
二、对我国EKC曲线的检验——以农村为例·····	(45)
三、环境EKC曲线中外生变量的影响分析·····	(56)
四、本章小结·····	(58)
第四章 经济发展与居民生活满意度的关系·····	(60)
第一节 收入与幸福悖论·····	(60)
一、国际上经济发展水平与居民生活 满意度状况的比较·····	(61)
二、国内各省经济发展水平与居民幸福感 状况的比较·····	(62)
三、我国居民总体幸福感在时间序列上的变动·····	(64)
第二节 个人收入与幸福感·····	(65)
一、传统效用函数下收入与幸福感的关系·····	(65)
二、数据与变量·····	(67)
三、数据处理的方法·····	(69)

四、回归结果及其讨论·····	(75)
第三节 地区经济总体水平与居民幸福感的计量分析·····	(84)
一、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的比较·····	(84)
二、人均GDP对幸福感的影响 ·····	(87)
三、本章小结·····	(89)
第五章 经济发展与居民生活满意度关系的解释 ·····	(91)
第一节 对幸福悖论的理论解释——相对收入理论·····	(91)
一、相对收入理论回顾·····	(91)
二、引入相对收入后的效用函数·····	(93)
第二节 对相对收入理论的计量经济学检验·····	(96)
一、计量模型的设定·····	(96)
二、参照收入的选取·····	(97)
三、收入分配与居民幸福感·····	(105)
第三节 对相对收入理论的实验检验·····	(109)
一、利用实验方法检验的必要性·····	(109)
二、理论模型·····	(111)
三、实验方法与调查设计·····	(113)
四、数据处理及分析·····	(116)
五、本章小结·····	(120)
第六章 生活满意度框架下的环境质量与 经济增长之间的权衡·····	(122)
第一节 传统的环境价值评估方法·····	(122)
一、国外的研究·····	(122)
二、国内的研究·····	(124)
第二节 基于生活满意度的环境价值评估方法·····	(124)
一、理论框架·····	(124)
二、现有的研究成果·····	(127)

第三节 环境质量与生活满意度函数关系的计量分析·····	(127)
一、宏观的生活满意度函数·····	(127)
二、微观的生活满意度函数·····	(132)
第四节 支付意愿的计算·····	(135)
一、边际支付意愿·····	(135)
二、超边际支付意愿·····	(136)
三、本章小结·····	(137)
第七章 在生活满意度的框架下实现环境与	
经济的协调发展 ·····	(138)
第一节 以生活满意度为目标,重新认识发展的内涵·····	(138)
一、重新认识发展内涵的重要性·····	(138)
二、改变衡量发展成就的标准·····	(139)
第二节 非物质化与均等化的发展·····	(141)
一、非物质化发展的含义·····	(141)
二、非物质化发展的可能性·····	(142)
三、非物质化发展的途径·····	(143)
四、均等化的发展·····	(145)
第三节 结论与展望·····	(146)
一、结论:改变现有发展模式·····	(146)
二、展望:未来的趋势·····	(147)
参考文献 ·····	(149)

第一章 引言

第一节 研究问题的由来

本书的主旨在于从生活满意度的角度来研究我国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问题，这就涉及到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为什么要研究我国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的问题；其二，为什么要从生活满意度的角度来进行研究。下面分别从这两个方面来说明本书研究问题的由来。

一、为什么要研究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的问題

Friedrich Schnidt-Bleek在《人类需要多大的世界：MIPS——生态经济的有效尺度》一书中写到：“工业化世界的人们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创造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壮举。凭着决心和机器，他们成功地实现了一个难以想象的物质财富水平。由于这些努力，工业化国家的人们生活在前景光明、产品丰富、服务周到的社会里。无疑，这决定性地降低了人们生存的不确定性和冒险性。对成千上万的人而言，这财富使人们摆脱了为食物、原材料和能源需求而进行的日常奋斗。如果这都说不上是最大意义的进步，这都说不上是人类文明的成果，那么又有什么可以称得上是进步，称得上是成果呢？”

（Friedrich Schnidt-Bleek，2003）的确，人类在近两个世纪里取得了物质生产上的巨大成就，极大地改善了人类的生存状态，这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一个强有力的证明。然而，我们也必须看到，这种文明的进步却是以改变我们的生存环境为代价的，由此造成的后果也是非常严重的。

环境改变的直接后果就是使公众的健康受到了影响。环境问题首先由于对公众健康造成重大危害的公害事件而受到人们的关注。20世纪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八大公害”事件，即比利时马斯河谷烟雾事件、美国多诺拉烟雾事件、伦敦烟雾事件、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日本四日市哮喘病事件、日本“骨痛病”事件、水俣病事件和日本米糠油事件。这些公害事件对大量人群的健康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很多人为此失去了生命，更多的人则要忍受终身的痛苦。但是，这些仅仅是众多公害事件中受到人们关注的那一小部分，还有大量的危害没有引起广泛的关注，因此，实际的损害比报道的要严重得多。公害事件的后果是严重的，因此，也引起了各国政府的注意，并且采取措施来防止类似事件的再度发生。

除了对人类健康的威胁之外，人类经济活动的破坏性还体现在生态环境的恶化上。自从20世纪中叶以来，地球表面的土壤已经损失了1/5，热带雨林损失了1/5，数以万计的物种已经灭绝。此外，人类活动对大气成分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由于CFCs（氯氟烃）的广泛应用，臭氧层受到严重破坏。1985年，美国科学家首次在南极上方发现臭氧层空洞，到1998年这个空洞的面积已经达到2 720万平方千米。此外，以二氧化碳为代表的“温室气体（Greenhouse gases, GHG）”的大量排放使得全球气候发生变化，这对地球的生态系统可能造成无法预料的严重后果。

经济活动过程中不断产生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早已引起了科学界和各国政府的关注，并且也发展出相应的对策体系。科学技术人员发展出广泛技术来防范可能的环境破坏。大量的公害事件之后各国政府采取的管制措施也是相当严厉的。然而，无论是科技的进步，还是政府的管制，都不能杜绝经济活动对环境可能造成的损害。进入科学发达的20世纪后半期，世界各地仍然不断发生的各种石油泄漏事件就是很好的证明。1989年3月23日夜晩，搁浅的艾克森瓦迪兹号油轮泄漏了4 163.5万升（1 100万加仑^①）的原油，油水混

^①加仑（gallon），1加仑（美）=3.785升

合物浸入到了25厘米深的地下，给当地的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的破坏。甚至在20年后，灾难发生地美国阿拉斯加州海岸仍旧覆盖着大量的石油。2010年4月20日发生的美国墨西哥湾漏油事件导致墨西哥湾沿岸1 609千米（1 000英里^①）的湿地和海滩被毁，墨西哥湾水域共约14万平方千米的区域被禁止捕鱼，脆弱的物种灭绝，这成为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漏油事故。这次事故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和环境破坏已经是难以衡量的了，而其长期的生态环境影响则更是难以想象的。

各种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不断暴发的后果是人类的发展面临不可持续性的困境。虽然科学技术的进步可以帮助我们更有效地利用现有资源并且寻找新的资源，但是，如果不能有效防止地球生态系统的崩溃，人类的生存将会遭到威胁。

在我国，由于长期存在的二元经济结构，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的问題又多了一层含义。我国的二元经济结构特征决定了我国长期面临着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与经济工业化同时发展的趋势是城市化。城市化的发展带来了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城市人口急剧增加，城市本身的环境受到了严重的破坏；另一方面，城市的扩展也侵蚀了农村地区的环境。因此，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不仅给城市带来了严重的环境问题，也给农村带来了严重的环境问题。可以预见，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仍将长期存在，在这种情况下，环境与经济发展不协调的问题也可能长期存在，因此，值得我们特别关注。

总之，在各国经济工业化和社会城市化的过程中，由于没有考虑到对环境的影响，最终造成了现有的发展模式难以为继。要使我们的社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就必须重视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问题。

二、为什么要从生活满意度的角度来进行研究

应该说，经济增长与环境发展不协调的问题已经引起学术界和

^①英里（mile），1英里=1.609千米

政治家的广泛重视，这是值得欣慰的。然而，经过相当长时期的努力，我们并没有达到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目标。这其中的原因很多，但是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传统发展观的制约。因为，从传统的视角来看，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本身就是矛盾的。在无法调和这种矛盾的时候，人们往往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求得经济的增长，从而导致环境与经济两者不能真正协调发展。

传统的发展观是一种以物质财富为中心的“经济至上主义”。自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全球取得优势地位以来，这种“经济至上主义”就在全世界范围内逐渐盛行起来。“经济至上主义”把经济增长和物质财富的增加看成是最重要的事情，认为物质财富的增加会自然而然地提高人们的福利水平，从而化解一切社会矛盾。弗·卡普拉指出：“几乎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是围绕着一个共同的，甚至可以说是唯一的目标进行，这就是追求更多的物质财富”（弗·卡普拉，1989）。在经济发达国家，尽管人均物质财富早已超过了满足基本生存需要的水平，但是追求物质财富增加的脚步仍然没有停下来。在经济落后国家，由于受到经济富裕国家的影响，人们对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方式和西方的生活方式都存在着盲目的崇拜，因此，“经济至上主义”在不发达国家尤其盛行。

中国也未能避免这种“经济至上主义”倾向的影响。中国政府对GDP的重视程度是空前的，甚至可以说存在着“GDP崇拜”的倾向。不仅在中央政府层面过于重视国家GDP在世界经济中的位置，而且各级地方政府也都把本地GDP的跨越式增长作为主要的政绩目标。尽管中央政府已经意识到仅仅追求经济总量的快速增长会带来一些问题，并且主动降低了“十二五规划”中GDP的增速目标，但是，在地方层面，许多地方的“十二五规划”仍然把GDP总量或人均GDP的高速增长作为重要的政绩指标，有些地方甚至提出5年翻番的目标。

“经济至上主义”虽然能够促使经济在短期内迅速增长，但是，从长期来看最终却会制约经济的持续增长，也制约着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因为在传统的“经济至上主义”视角下，环境和经

济发展之间必然存在着矛盾。按照传统的观点，要保护环境，就需要付出额外的经济成本，而这必然会影响经济增长的速度。由于物质财富的生产被放在最重要的位置，许多国家和地方都走上了一条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即先把物质产出量提高到一个相当的水平，然后再回过头来治理环境污染问题。即便是在发达国家，当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矛盾的时候，经济增长仍然被放在首要的位置。每当经济发生衰退，发达国家的政府都会尽力使用各种政策工具来刺激经济，而对保护环境的政策执行则会相应地放松要求。

此外，在传统发展观下，人们将解决环境与经济发展不协调问题的希望寄托在提高技术水平上。虽然技术水平的提高可以在现有的物质产出水平下部分地缓解经济与环境的不协调问题，然而只要仍然坚持经济至上的发展观，我们就要产出越来越多的物质产品，对环境造成越来越大的压力，从而使技术进步的作用被抵消。技术进步与人们物质欲望在不断地进行相互的赶超，而人的物质欲望提升的速度总是能够超过技术进步的速度，因此，环境的压力也会越来越大。

因此，在传统视角下，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是相互矛盾的两个目标，尽管我们也知道两者之间存在相互的影响，但是看不到两者之间的统一之处。如果我们能够换一个角度，从生活满意度的视角来看待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的关系，则有可能将两者统一起来。从生活满意度的角度来看，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都是实现一个更高层次的目标，即生活幸福的手段。实际上，不论我们是发展经济，还是保护环境，最根本的目的还是提高人们的生活满意度。从这个角度来看，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都只是手段，而不是最终的目标。我们以前把它们都作为目标来看，因此，往往只看到两者的对立之处，却看不到两者的统一之处。

第二节 文献综述

一、关于可持续发展的思想

1962年,卡森(Carson, R.)出版了《寂静的春天》一书,在这本书中,卡森阐述了农药对环境的污染,分析了化学杀虫剂对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带来的危害,指出当农药泛滥,昆虫肢解,土壤板结,花草带毒,水质败坏,殃及鱼虾,鸟禽瘫痪,走兽灭绝,世界上只剩下了自私的人类,一片寂静与所谓自由,到来了。这本书引发了公众对环境问题的注意,促使环境保护问题提到了各国政府面前,各种环境保护组织纷纷成立,从而促使联合国于1972年6月12日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了“人类环境大会”,并由各国签署了“人类环境宣言”,开始了环境保护事业。

1972年,罗马俱乐部^①的成员发布了一个报告《增长的极限》。该报告认为,增长是存在着极限的,这主要是由于地球的有限性造成的。他们发现,全球系统中的5个因子是按照不同的方式发展的,人口、经济是按照指数方式发展的,属于无限制的系统;而人口、经济所依赖的粮食、资源和环境却是按照算术方式发展的,属于有限制的系统。这样,人口爆炸、经济失控,必然会引发和加剧粮食短缺、资源枯竭和环境污染等问题,这些问题反过来就会进一步限制人口和经济的发展。如果人类社会按照当前的趋势继续发展下去,到2000年,这个世界将会比现在生活更不安全、人口更拥挤、污染更严重、生态更不平衡。如果不采取全球性的措施来制止或减缓人口和经济组织的发展速度,则在一百年内的某个时刻,人类社会的增长将会达到极限,此后就是人类社会不可逆转的

^①罗马俱乐部是关于未来学研究的国际性民间学术团体,也是一个研讨全球问题的全球智囊组织

瓦解。

博尔丁（Boulding）在1966年的一篇文章（《即将到来的宇宙飞船地球经济学》）中提出，传统的经济是一种所谓的“牛仔经济”，而我们将来的经济是一个“宇宙飞船经济”。地球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就像一艘孤立的宇宙飞船，它的生产能力和净化污染的能力都将是有限的。在飞船经济里人们如果想要无限制地生存和发展下去，就必须转变对待产出和消费的态度。在“牛仔经济”中，消费同生产一样被视为好事，人们往往以总产出的多少来衡量经济是否成功。然而，在“宇宙飞船经济”中，我们最应该关心的是资本的维持，要以更少的产量来维持一个既定的资本存量。在这种情况下，产出和消费不仅不应该最大化，反而应该最小化。虽然博尔丁（Boulding）所描述的“宇宙飞船经济”并不是我们经济的现有形态，而且在短时期内也还不会到来，但是，毕竟给我们提出警示，我们需要反思现有的发展模式，否则，我们的子孙后代将在不远的将来面临着“宇宙飞船经济”。

Friedrich Schnidt-Bleek认为，正是我们的创造性、我们的机器、我们对越来越多的物质财富与越来越详尽的服务的强烈的占有欲，一步步将自己推向生态崩溃的边缘。现有的物品、服务及基础设施，其物质与能量太集中了，我们必须利用全新的技术，抱着关心后代幸福安宁的态度，来创造一种非物质化的经济。如果承受得起，必须使西方经济平均非物质化掉90%或者更多，就像经济的非能量化一样。经济非物质化并非意味着倒退；相反，它意味着进步，因为没有技术的进步，就不可能实现经济非物质化。我们可以把非物质化看作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一条技术途径。为了实现可持续经济，我们必须同时做到以下两点：一方面，必须找到繁荣的新模式；另一方面，必须找到解决我们对机器的依赖性的更好的技术办法。他提出用一种新尺度，即“每单位服务的物质消耗（Material input per service unit, MIPS）”来作为环境压力的测量手段，就是要求“从摇篮到摇篮”地计算每单位服务或功能的物质消耗。

上述研究可以说是经济学家对可持续发展问题较早的思考，

这些研究虽然在论证过程中存在着一些缺陷,但是,其基本的思想还是极具启发性和前瞻性的,有很多观点即使在几十年后的今天来看也是值得关注的,由此也引发了学术界对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广泛关注。

二、关于环境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研究

上述所列举的一些研究虽然已经关注到了资源环境对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约束,提出了一些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设想,但是,还没有涉及到环境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问题。

环境经济学家通常借助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来分析环境质量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Grossman和Krueger在1991年对42个国家城市地区的研究发现,两种空气污染物(SO_2 和烟尘)的浓度与人均国民收入之间存在着类似库兹涅茨曲线的“倒U型”关系,这种关系被称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假说。此后,Shafik和Bandyopadhyay(1992)使用3种不同的函数形式对10种污染指标进行了分析,发现有两个空气污染物符合“倒U型”的EKC假说。Sleden和Song(1994)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对4种空气污染物的EKC进行了估计,提出“倒U型”的EKC存在的原因可能在于低人口密度的国家采取严厉的环境标准的压力较小。此外,Grossman和Krueger(1995)等的实证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也支持了EKC假说。

我国学者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开始研究中国的EKC问题。例如,张晓(1999)利用1985~1995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对我国经济发展与大气污染水平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验证,结果表明,我国大气污染与人均GDP之间在一定程度上存在EKC关系。彭水军和包群(2006)运用1996—2002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对我国经济增长与包括水污染、大气污染与固体污染排放在内的6类环境污染指标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检验,发现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是否成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污染指标和估计方法的选取。王志华、温宗国、闫芳和陈吉宁(2007)使用北京市1990~2004年间的时间序列数据对北京市主要污染物的EKC假说进行了检验,发现多数环境指标符合EKC假

说。沈锋（2008）考察了1985~2005年度上海市工业废水、废气和烟尘排放量与人均GDP之间的关系，发现上海市的环境质量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并不是简单的EKC关系。

虽然现有的许多实证研究支持“倒U型”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存在性，但是很多研究显示收入达到非常高的水平之后才会出现拐点，因此，在没有政府干预的情况下，要达到收入增加与环境质量改善同时出现的状态需要经历很长一段时期。按照人类现有的对生态环境破坏的速度，人类能不能坚持到那一天还存在很大的疑问。而且，很多生态环境的改变是不可逆的，环境破坏后要再恢复到之前的状态几乎是不可能的。此外，当国民收入达到一个很高水平之后，这个“倒U型”的关系是否还会存在，也是非常值得怀疑的。因此，如果仅仅根据现有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实证研究就乐观地认为只要经济发展水平提高了，环境问题就自然而然地得到了解决，这显然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

三、关于经济状况与主观幸福感关系的研究

学术界对人们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的研究由来已久，而且多个学科的学者均对幸福感的问题有兴趣。由于本书主要从经济学的角度来思考环境和经济协调发展的问题，因此，对有关生活满意度的研究综述也主要限于经济学界的研究。当代经济学家对幸福感研究兴趣的复兴主要源于Easterlin（1974）关于收入和幸福感关系的研究。Easterlin发现，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尽管美国的人均实际收入有了显著的增加，但是，所观测到的幸福感水平并没有相应的提高。此后，Scitovsky（1976）在《Joyless Economy: An Inquiry into Human Satisfaction and Consumer Dissatisfaction》一书中对于为什么更多财富没有引起更多幸福感的解释也引起了经济学家的注意。上述研究提出了所谓的“幸福悖论（Paradox of happiness）”，即一方面，在一定时点和一定国家之内，收入和幸福感呈正相关的关系；另一方面，在时间序列中，无论是个人还是国家平均的幸福感都没有随着实际收入的增加而显著提高。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需要得到

合适的解释。一种常见的解释是所谓的“相对收入假说（Relative Income Hypothesis, RIH）”。相对收入假说认为，影响人们幸福感的不是收入的绝对数量，而是人们对收入的满意程度，而这种满意程度取决于收入的对比，即相对收入。在实际的研究中，相对收入理论又分为两种类型。一种类型是建立在所谓的“相互依存偏好（Interdependent preference）”的基础上的，强调人们与同时期其他人的比较，也就是说，人们进行比较的基准是出于一种社会的考虑，被称为“外在的”或“社会学的”基准。按照这种理论，人们在同一时点上的收入越高，相对收入也越高，因此，高收入能够带来更高的幸福感。但是，在时间序列上，如果所有人的收入都提高了，则人们进行比较的基准也提高了，从而提高收入就不会带来幸福感的增加。另外一种类型是建立在所谓的“习惯形成（Habit formation）”的基础之上的，强调人们与自己过去的经验进行的比较。这种比较的基准是出于一种心理上的考虑，被称为“内在的”或“心理学的”基准。按照这种理论，人们在收入提高的初期会有更高的幸福感，但是，由于人们的适应性，收入提高后比较的基准也会提高，因此，从时间序列来看收入提高并不能持久地提高幸福感。不过，这种理论可能会认为即使在同一时点上高收入也不能带来更高的幸福感，因为现在的高收入者可能以前就是高收入者，因此，他们的比较基准本来就很高，从而高收入者不见得比低收入者更幸福。这两种相对收入理论各自有其优势和缺陷，因此最近的研究倾向于将两者结合起来。尽管很多学者的研究支持相对收入假说，另外一些学者，例如Frank（1984），Oswald（1997）等认为，绝对收入和相对收入都会影响幸福感，只不过绝对收入的影响要小一些。

经济学家们的研究发现，失业通常能够使人产生强烈的不幸幸福感。Clark and Oswald（1994）使用英国家庭追踪研究（British Household Panel Study）1991年的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在1991年英国的失业人群比就业人群的幸福水平低很多。而且，失业在降低幸福感方面的影响比离婚或者夫妻分居的影响更大。Winkelmann